

“伤痕文学”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再思考

——以知识分子为考察中心

章涛

郭志刚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1年初版本最早将伤痕小说纳入文学史。身处历史现场的优势让著史者

对文本中细微的差距极为敏感，他们很快根据作品中人物在思想情感上表现出的微妙不同，为新时期初的文学创作划分出了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等不同类型。但随着主客体间距的拉大，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内在的相似性远大于彼此的差异。洪子诚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文革’亲历者讲述的创伤记忆，或以这种记忆为背景”构成的作品“统称为有关‘文革’的伤痕文学”。这一概念被其后的研究者广泛接受，本文所说的“伤痕文学”也沿用于此。

新世纪以来，借助于文化研究，“伤痕文学”的研究迎来了新的高峰。在“叙事的意识形态”的视角下，学人发现了文本中知识分子受难者“双重身份”和“内部重续”的话语策略。比如程光炜就准确地抓住了钟亦成的“伤痕”所指背后“呈现出与历史‘共谋’时所彰显的叙述的逻辑”。进而指出“伤痕”叙事是如何被转化为“遵奉党和人民之命”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而主流权力话语又如何利用对特定受难者伤痕和当下原宥姿态的展示，宣布自身与“文革”意识形态的断裂关系，以及与“十七年”革命意识形态的直接联系，从而证明其话语资源的历史合法性。

毫无疑问，这种解读方式和所得出的结论极富创见，可称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次重要突破。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在现有的研究理论视域下，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被遮蔽。文化研究的确能有效地进入文本和历史的缝隙，但研究者在揭示“伤痕”与主流话语的“共谋”时又迅速将之本质化和一体化为压抑/妥协模式，忽略了重构新时期文学话语时作家的主体能动性。其次，就其成果来看，研究者显然将20世纪80年代理解成一个文化事件而非文学史事实，这暗示了研究者想象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基准，也导致学人往往以外体制和政治文化研究取代内部形象分析。如此一来，“重返”便忽略了对文学自身内涵

的细致把握，而是转向了对知识分子主体性缺失的意识形态化讨论。并不是说后者不能讨论，但如果脱离了人物形象的细节性解读，那么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就会偏向文化史、思想史的书写，从而与“重写文学史”的初衷和要求都形成了错位。

基于以上现实，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关于伤痕的想象再次“问题化”，充分地考察历史转型过程中诸多话语主体的矛盾和统一，重新确认其文学史位置。因其所具有的自我身份指认和主体建构功能，对知识分子受难者形象的书写构成了“伤痕文学”的主要内容之一。限于篇幅，下文选择重点讨论在“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中被普遍忽略的两类知识分子受难者形象，揭示叙事者如何通过形象的“不在场”建构另一种叙述“异质”伤痕的话语范型。

一、“伤痕文学”中“有机知识分子” 编码及其悖论

表面上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伤痕文学”文本。罗群作为当代文学中“第一个错划为右派而又恪守革命信念的人物形象”，用坚强的革命意志支撑着写成了有极强现实意义的学术论著。吴遥作为反面形象，则被描述为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奸佞小人”。正是这两个颇具正/反道德化色彩的形象组成了文本叙述知识分子伤痕的合法性凭证，也因此构筑了研究者解读小说的政治化阐释模式——罗群的社会主义信仰使其伤痕能被顺利转述为革命者对正确意识形态立场的坚持。此时罗群所受折磨、打击和迫害越深重，他对于学术研究的热情就更具有坚持“正确路线”的政治意义，而吴遥这个“思想僵化、顽固抵制党的路线的干部典型”则从另一个侧面配合意识形态的话语改装机制，将“文革”的苦难和由此造成的伤痕归咎于历史中“个别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从而反证了新时期意识形态话语的存在及其话语资源的合法性。

但从叙事结构上看，《天云山传奇》其实是一个架构在爱情主题上的革命文本。事实上，作为常见的故事

情节或叙事主题，“爱情”在大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形象的“伤痕文学”中都有表现，并服务于知识分子“伤痕”的叙述，使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构逻辑同步。同样，罗群和冯晴岚的结合自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两性吸引，而是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既是对苦难的抗争和极左政治的控诉，又象征着对知识分子理性和理想的保护。因此，他们的婚姻与“欲望”和“情感”毫无关联，作家不但极少表现两人之间的私人互动，还不断用革命话语“合情合理”地过滤了爱情生活中大部分的个人欲望表达，由此生产出的也就必然是某种类似“十七年英雄人物”的形象符码。保证了爱情革命性和纯洁性的同时，也就保证了革命历史主体的正义性和纯洁性。

然而，小说中另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宋薇似乎被很多研究者遗忘了。说她特殊，主要是因为这一形象很难被纳入现有的谱系。葛兰西曾在《狱中札记》里将进入“组织”，并主动参与社会价值体系生产与改造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组织的正常运转和权力生产提供有效的服务，其本人也被组织充分地吸纳和结构化。宋薇正属于此行列。而作为“组织内”未被要求接受改造、且于“文革”政治运动中少数获得实际利益的知识分子，她还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制造了罗群和冯晴岚的生存困境。但鲁彦周却没有二元对立的将之处理为反面形象：第一，他没有将宋薇作为吴遥式的权力狂加以批判，而是着重描写她坠为丈夫政治欲望附属品的悲哀境地；第二，鲁彦周本可以借她与罗群之间的感情断裂指责其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错误甚至反动，但他却背离了权力话语的预设轨道，对这个形象表现了相当的包容和同情。

这意味着不论是主观还是潜意识，作家已经认识到，尽管缺少“肉体改造”和“灵魂受难”环节，但宋薇身上确实具有某种“悲剧性”。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外在于情感的政治意义加以祛魅便会发现，被遗留下来的实则是一个女性不断遭受感情创伤的故事。宋薇起初与罗群相恋，因为组织的决定又与他分手，这个痛苦的过程在她心上刻下了第一道伤痕。随后，又根据组织的要求，她与吴遥结合。后者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安全感，而是将她变成了丧失独立人格的傀儡，于是第二道伤痕形成了。直到最后宋薇下定决心离开家庭，想要重新投入罗群的怀抱。但此时，罗群身边已经有了周瑜贞，她关于个人幸福的憧憬和要求将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回应

与满足，这构成了第三道伤痕。

作者既然能够将许多复杂的感情要素编入小说，还将每段感情的选择赋予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和功能性，那么宋薇伤痕的被回避，就只能解释为与主流权力话语之间的“不兼容”。小说中给出宋薇离开罗群的理由是因为政治的天真和被人利用：“我们是既天真又幼稚，那时又哪里有自己的正确的是非观念呢！”“正因为这样，有那么一些人，就以党的身份在你面前出现，他们说他们代表组织，而我们就把他当成组织，尊重他，服从他，甚至压制自己的痛苦而坚决照办。”对以上文字稍加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天真”的本质实际上是对组织的信任。出于同样的信任，她从最初的抗拒，到自我怀疑，到最后的接受结果并配合意识形态展开自我批判，答应与吴遥结婚。更进一步来说，宋薇的伤痕来源于其情感选择的被动性，这种被动姿态可以视为是作家的某种为形象辩护的修辞策略，它理应构成受难证明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宋薇被组织反复规劝接受吴遥的过程还隐喻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被意识形态话语一步步以“革命”的名义内化为“组织内”的一员。但组织错误的引导暴露了“十七年”意识形态对知识主体的“规训”机制，以及机制内部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质言之，宋薇对组织无条件的信任来自体制对她的全面规训，而正是这种信任造成了宋薇的感情悲剧。因此她携带的伤痕的控诉对象并不指向文化大革命，而是作为整体的革命话语本身。这时，如果深入挖掘宋薇的伤痕，那么她所可能提出的反思问题将远远超过革命话语的预设解答范围，甚至直接导致对整个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合法性的质疑。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十七年”为“正纲”的文化政治语境下，这种知识分子服从于主流权力的姿态非但不可质询，反而还是被继续作为“十七年”革命话语的优秀遗产而大力提倡的。因此，宋薇的伤痕不但不能被作为其苦难的证明，甚至因为其爱情叙事中过强的私人化色彩和对革命内部的荒谬与暴力的反指，而只能在叙事的“潜文本”层面得到书写。

在结尾，作家安排了一段情感的升华来弥合人物伤痕与主流权力之间的裂隙，将形象从回忆伤痕的痛苦中抽离出来，转向歌颂新意识形态许诺的光明未来。但矛盾只是被压抑，却未获解决。80年代初便已经有人提出：“在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下，她错了么？又错在哪里？故事既然是以她的口气叙述的，我们看到了她二十年后

的一些自责：幼稚、小资产阶级、政治虚荣心，等等。但是，真的就应该责备她么？”提问的背后是对“标准”的困惑：知识分子要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要跟着党走，什么时候又要自觉抵制所谓错误的命令？当身处历史现场的知识分子被指认为小资产阶级时，这种抵制要如何发生？一旦发生，是会被默认、赞许还是被再次规训？这是一个“组织”本身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与罗群同为“有机知识分子”的宋薇，她的伤痕却因其内部存在太多与主流权力彼此解构、彼此矛盾的质素，无法被转述为新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失去了被正面展示和叙述的机会。

二、“伤痕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 规训及其评价

如果说宋薇是类似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她身处于“组织”内部，听从于政治话语同时也生产新的政治话语，因为受难经历的特殊性导致伤痕内涵的敏感和编码的失败，那么王蒙《蝴蝶》里的海云更像是班达在《知识分子之背叛》中提到的游离于世俗权力以外的知识分子，或是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描述的，未被革命话语完全规训的“现代知识分子”。

有研究者曾以鲁迅著名的“娜拉命题”比附现代知识分子步入革命后遭遇的困境，从海云的角度来说，她的生命轨迹正沿着娜拉的出走继续发展。追求自由的灵魂在归于革命浪潮的途中惊觉自己不知不觉地误入组织规训的藩篱，为了保持独立的判断力，她拒绝接受既定的政治套话，因此在做出新的“意识形态选择”后海云立刻面临了生存环境骤变下的理想危机，不但离开了自己的革命引路人，甚至为了抵抗被扭曲的革命伦理献出了生命。

与鲁彦周类似，王蒙显然也意识到了海云身份的特殊和必然到来的悲剧，他甚至在两人相识和相恋之初的场景里就为他们日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文本中细节的描述可以几乎立刻唤醒读者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记忆，特别是杨沫在《青春之歌》里对江华与林道静之间“布尔什维克感情”的发展的着意刻画——作为一个进步女学生，因为追倾心于革命改天换地的激情，海云毅然决然地接受了年长她十三岁的革命家张思远的爱情。然而我们注意到，张思远可以在气质、身份和地位上酷肖江华，但海云毕竟不是在受尽磨难后被意识形

态赋予合法通行证的林道静——她充其量只是一个被进行到高潮的革命浪潮裹挟进一系列斗争运动的“同路人”，代表了被时代话语的洪流激动着而义无反顾追求某种神圣的“解放”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接受的“革命”理念来自纷乱的战火，而实践革命想象的现实空间却是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并迅速着手建构起体制化权力运作机制的50年代。前者是浪漫而不羁的，以个体之身反抗权威的举动具有天然的历史和政治合法性，但后者却是在相同的话语容器中设计了截然不同的话语生产和认识装置，它承诺个人以光明的未来，但同时也不容置疑的要求个体放弃现实的幸福。对于海云来说，这其中是否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没有来得及被组织系统且完整的规训，她仍明显保留着独立思考、甚至要求独立话语空间的“知识分子本能”，这使得她在靠近革命所承诺的幸福和希望的几乎同时，就已经感受到了革命的政治主体对知识分子主体的压抑和束缚。

鲁迅的深刻性在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就已经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与集团式革命运动之间天然的话语错位。然而，不断获得更高地位和更大政治权力的张思远将这种罅隙视为小资产阶级妻子的不觉悟，因此不断用宏阔的50年代革命话语对她的“阶级本能”加以教育和规训。悲剧的根结也在于此——不论出于何种理由，革命主体和知识主体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张思远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他只是近于粗暴地以泛泛而论的定调和一以概之的思想改造模式“帮助”海云成长为他心目中合格的革命者，而反过来说，张思远的所思所感、被动无奈和身不由己也无法为海云所理解。她在革命的规训下始终无法顺利改造自己的思想，不但在大学期间与一个男性发生“婚外情”，还因“为那些反党的小说喝彩”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揪出批斗。尽管作品语焉不详，但我们可以推测海云出现“婚外情”的根本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与张思远在知识结构上的严重断裂，而“这位始终没有在小说中现身的‘第三者’一定是与张思远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谱系，他对海云情感征服的话语武器，正是张思远的精神空间所缺失的以莫泊桑为代表的西方人道主义话语，而这种人道主义话语又是知识分子追求个体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根基和精神资源”。

可以说海云和张思远从结合到分手的过程,正隐喻了在革命话语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抱定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彼此吸引/缠结,又压抑/反抗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张思远断断续续的回忆中发现,海云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位置:在近二十年的“政治生命史”中,她从未表现出任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归从之意,这也就意味着,海云用生命抗争和殉祭的,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或“革命”的正确性和纯洁性,而恰恰是需要被前者规训的,具备独立个体特性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王国”。此时,对比受尽折磨也始终虔诚等待重蒙“党”的召唤的钟亦成,海云之死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异质性”不但显得极为刺眼,其殉道姿态的合法性也可能被新时期之初仍不免带着“左”的思想遗留的意识形态话语所质疑。换句话说,她被推向极致的苦难不但无法被转喻为主流权力话语的一部分,反而与之背道而驰。

因此,王蒙如何处理伤痕的表达就成了问题的关键。笔者以为,以张思远作为小说的唯一叙事者是有其深意的。首先,利用限制视角的话语空白,作家合理规避了对受难中的海云内心世界的描写,从而屏蔽读者接近海云在肉体 and 灵魂深处的痛苦(包括在道德层面置其于“死地”的“婚外恋”的真正原因),避免了形象经过伤痕的修辞而崇高化的阅读效果。其次,“伤痕文学”之于王蒙而言“不是为了倾诉伤痕,不是为了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怜悯的感情。而是相反,在这个失而复得的‘天堂’中,‘政治’被解释成一种重新焕发的政治激情,一种与主流话语同构的承诺”。如果将叙述的话语权交由海云,那么小说将变成对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揭露和控诉——不是普通意义上“伤痕文学”对“文革”极“左”话语的鞭挞,而是对整个新中国革命话语对知识分子主体,乃至对人性的扭曲的批判,它可能造成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必然是具有强烈“越界”效果的。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对党的忠诚以及对新时期继续革命的热情不允许王蒙对海云这个特殊的殉道者表达除了同情之外更多、更微妙的情感,而宁可将其置于叙事的边缘,也不愿冒风险暴露革命内部可能存在的“症候”。

三、“伤痕文学”文学史地位的反思

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正值过渡期,旧的革命叙事模式将破未破,新的叙事范型又未及建构,同一文学场

内对文学主体产生影响的话语资本数量远远多于以往,而不同的话语因素内部又并不统一。多重主体共同发声的结果,是彼此之间互有索取,也互有妥协,由此形成某种动态变化过程。此时,如果仅仅关注于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的压制和规范,就会遮蔽新政治文化的内在复杂话语结构,而如果全盘接受了所谓“新启蒙”的历史叙述,又可能放大知识分子主体性功能,这使得对“伤痕文学”内在话语结构的描述很难停居一处。但文学史本身倾向于本质化、确定化的表述,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形成了矛盾。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阐述结构”的需要扭曲真实的文学现场。传统文学史显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则抓住文学与政治的“共谋”关系,发掘新历史语境中主流权力话语一系列复杂的“知识和话语的转换过程”^⑩,实现了对既存文学史叙述的突破。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首先,新时期之初的主流文学话语内部并非如重返者所设想的那样铁板一块。比如在对待“伤痕”的态度上,尽管以陈荒煤、冯牧为代表的文艺领导人频频为其合法性辩护^⑪,但依然有人将“文革”后出现的以揭露、控诉“文革”与“四人帮”为主题的文艺指为“向后看”“缺德”而大加反对^⑫,这种分化暗示了主流话语内部对未及明朗的“现代化远景”的想象出现了矛盾。其次,新时期之初的知识分子话语也不稳定。以《蝴蝶》为例,亲历了极左话语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后,王蒙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反思呈现出反阶级二元对立和理性化的特点,频频在叙事中以“人”的立场替换了“前三十年”所惯用的“人民性”视角,同时也用“人”的悲剧解构极左政治的合法性,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主流话语的内在矛盾的双方其实操持了相同的“元话语”,都要求知识分子回避以个体的伤痕直接质询、甚至挑战主流话语的内部矛盾,因此尽力避免文本的社会批判效果从文化大革命一路上溯到批判“十七年”政治伦理,以至与主流权力话语对“文革”的封建复辟定性和单向化的断裂定规发生矛盾,自觉地对潜在的越界形象加以限制和规范。

对此,大部分重返者将之归结为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集体无意识”^⑬,也有人将之理解为“前三十年”全面思想改造运动及其革命认同模式在新时期的承继与复现。以上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但更关键的是,作家的回避姿态和共谋策略首先反映了

新时期之初主流话语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想象。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正式以“文学为人民服务,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替代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脱离政治存在,事实上,在“文革”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代文学场域内最有效的象征资本依然来自革命政治话语,周扬就指出:“一个革命的作家没有一点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感情,革命的意志,怎么叫革命的作家呢?”“现在重新强调革命现实主义,这是十分必要的。”^⑤而现实的政治体制重构实践又急切召唤文学话语发挥其意识形态转译的功能,用胡耀邦的话来说:“作家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努力塑造最美的最高尚的灵魂。”“进步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应有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和改造社会的作用。”^⑥这为急于再次回到社会话语中心、重新获得政治话语资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机会,他们一方面利用主流话语的内在矛盾为伤痕叙事寻找话语生长的空间和叙事的合法性证明,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其话语资格,作者又必须小心翼翼在意识形态立场上遵循政治权力规定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原则,在整体上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归魅冲动。

从这个角度来说,作家与意识形态的共谋/同构就不仅是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妥协,其中还有着更为自觉的、基于政治现代性想象的主体身份建构意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建构却又恰恰是另一种层面的自我解构,并深刻影响了“伤痕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及意义:第一,就初衷而言,描摹“伤痕”是为了清算其背后的历史话语,这理应是文学脱离意识形态全盘掌控,返回自身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步骤。但介入政治改造的前提却是作家必须首先认同其基本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一旦他们接纳来自权力主体的监督,同时将自我构陷的历史转述为革命受难者对历史悲剧的无言忍耐后^⑦,“伤痕”的“控诉性”和反思极左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力就被极大程度的限制,叙事转而配合新权力话语的再生产,对进入视野的形象范型加以筛查,主动退出、遮蔽对可能与主流话语产生矛盾的知识分子伤痕的叙述,“革命/政治伦理”则在“爱国”和“爱党”的名义下再一次被接纳和凸显^⑧,而“个人”的伤痕在某种程度上被重新归于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

这也提醒我们,传统文学史中作为“伤痕文学”关键话语资源的“新启蒙”的文学史叙述需要加以辩证的阐释。前者总是将新时期文学指认为“新启蒙”意识形态

框架下的产物,并将后者与五四时期的现代性启蒙加以联系,却无视了话语主体的生产过程及其内部特殊而复杂的话语运动:“现在有人讲要恢复‘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要回到‘五四’,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五四’时期的文学才是现实主义的,至于后来的什么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至全国解放后产生的许多激动人心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作品,似乎都不是现实主义的。”^⑨由于知识分子是在话语改装的历史角色中重构了自身的启蒙主体性,这决定了后者更像是“革命”主题下的话语衍生物,知识分子作家也倾向于以革命的名义重返“正确”的“工具理性”状态。再加上主流话语有意识的引导规约,将对伤痕的叙述简单冠以“启蒙”之名显然不妥。

第二,也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文学从最初走出“文革”时倾向重构主流话语的“伤痕文学”,发展到1985年前后寻根和先锋文学自觉的追求“非阶级性”的文本表征,其内部有一条环环相扣的逻辑链。而作为话语转换的关键一环,伤痕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起源,“它的历史境遇、内在矛盾以及生长性因素,对于整个‘文革’后的知识分子写作来说,都有重要的‘原型’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制约着其后知识分子写作的历史发展和基本面貌。”^⑩但以揭露主体伤痕为目的的叙事悖论性演变成对历史苦难的抚慰甚至遗忘,这导致对具有独立启蒙意识的知识者形象的重建与反思工作也被一并悬置、延宕或替换了,当代文学因此错失了一次以“他者”视角重审、重塑自身价值标准的机会。

推而言之,今天我们考察当代知识分子写作的文化悖论和内在精神信仰缺失时,“伤痕文学”应构成考察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围绕着“伤痕”展开的一系列带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叙述构成了80年代初期的主要文学和文化景观,也初步确立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再次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关系。而随着新文学体制的重建和调整,再加上市场化浪潮的剧烈冲击,等到80年代后期政治话语逐步退出文学场时,“精英文学”却发现自己处于曲高和寡、鲜人问津的尴尬境地,萌芽中的启蒙话语未及完整建构便以断裂问卷的形式被从主流话语中放逐。这意味着“文革”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性始终未能建立,此时,知识分子或是顺从当代文学制度的公开召唤再一次“组织化”^⑪,或是主动向市场倾斜^⑫,但都似乎都没有资本,也来不及再度返回话

语原点重拾主体的独立性。而早在知识分子以编码“伤痕”为条件换得意识形态对其叙事身份的首肯时,这些问题就埋下了历史的伏笔。■

【注释】

此处引用的是修订后的版本。在1999年的初版本中,洪子诚已经形成了这一理念,只是没有如此清晰地表述出来。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2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如何言宏等学者在论述中也提及了“伤痕”“反思”小说的内在一致性,但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名称。

程光炜《革命文学的激活——王蒙创作自述与〈布礼〉之间的复杂缠绕》,见《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张光年文集》(第三卷)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何言宏对此有专门的分析。见《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于现代性问题》80—8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何孔周《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住——谈〈天云山传奇〉中吴遥的形象》,载《人民日报》1980年2月6日。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吴子敏《道德观念上的歌颂与谴责》,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参见[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16—17页,三联书店2013年版。

杨丹丹《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信仰的文学表述》,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温奉桥《王蒙·革命·文学》208、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①《韩少功、王尧对话录》,41—42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陈荒煤《〈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9月19日。

③较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如黄安思《向前看啊!文艺》,载《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李剑《“歌德”与“缺德”》,载《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淀清《歌颂与暴露》,载《河北

文艺》1979年第6期。

④余时英《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见《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66—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2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⑦洪子诚将之称为“幸存者”意识,“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洪子诚《“幸存者”的证言》,见《重返八十年代》,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针对丛维熙在新时期之初的创作,有人批评道:“我们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控诉‘极左’路线的滔天罪行,但不能用‘祖国’的名义来要求人们原谅‘极左’路线,这无疑把‘极左’路线带来深重民族灾难的责任,转移到‘祖国’名下。”“小说所谓的‘贞操’,一旦同屈原式的愚忠联系在一起,就变成‘忠孝节烈’之类外在于人的观念和封建社会束缚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了。这同‘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精神一致,但却同祖国和对祖国的爱无关。”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载《读书》1985年第5期。

⑨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见《剧本创作座谈会文集》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⑩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问题》,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⑪这方面以官方主办的文学评奖为典型,当代“前三十年”全国性的文学奖只有1954年的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国家主流文学话语主要通过文学期刊管理对文学实施掌控。20世纪80年代以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1978年开始,《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编辑部主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新诗奖,1981年中国作协主办专门针对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这些具有意识形态权威性的奖项以“经典遴选”的方式“期待、希望和欢迎某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因此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面貌。

⑫新世纪前后,几家大型纯文学期刊都因为市场的调整而面临改版的问题。有的成功了,有的则遭遇了失败,但总的来说,迎合市场是主流选择。陈洁《文学期刊改版后的生存状态》,载《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30日。

(章涛,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